

目 录

成都经济年鉴

1987

成都概述

1986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部门分述

区县分述

经济工作文件选

1986年纪事

附 录

成都概述

经济地理概况	1
城市历史沿革	4
近代经济简述	10
解放36年经济建设的主要历程	13

1986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	19
经济发展简析	23
经济体制改革	25
对外横向联合	27

部门分述

工业	29
工业综述	29
机械工业	32
电子仪表工业	44
军事工业	56
汽车拖拉机工业	59
冶金工业	65
化学工业	68
医药工业	71
食品工业	76
纺织工业	78
丝绸工业	84

一轻工业	88	物资	179
二轻工业	93	对外经济 旅游业	187
商办工业	99	对外经济	187
建材工业	104	旅游业	190
电力工业	108	交通邮电	193
煤炭工业	116	综述	193
民政工业	124	铁路运输	196
乡镇工业	126	公路交通	198
农业	130	交通管理	201
综述	130	民用航空	202
粮食作物	131	邮政通信	206
主要经济作物	132	电信通信	210
林业	135	基本建设 建筑业	213
畜牧业	136	基本建设	213
养蜂业	137	建筑业	215
渔业	137	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	221
乡镇企业	138	专述	221
农机事业	140	城市规划管理	226
小水电	141	市政设施建设管理	230
水利事业	141	城市公用事业	233
气象事业	142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管理	237
农科教育事业	143	园林绿化建设管理	241
农业区划	144	城市环境卫生	245
重要事件及活动	146	城市环境保护	246
重点农业工程	148	乡镇建设	249
部分企事业简介	149	部分企事业简介	253
商业 物资	153	财政 税收 审计	258
商业	153	财政	258
流通体制改革	153	税收	263
成都市场巡礼	156	审计	265
工业品行业	158	金融 保险	267
副食品行业	163	金融	267
饮食服务业	165	保险	276
供销合作商业	169	工商行政管理 物价 标准计量	279
粮食商业	171	工商行政管理	279
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174	物价	282
集体与个体商业	177	标准计量	284

教育	288	邛崃县	463
教育综述	288	蒲江县	473
基础教育	289	新津县	481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294		
普通高等教育	297		
成人教育	305		
科学技术	310	政府工作报告	
自然科学技术	310	(1986年4月16日在成都市第十届人	
哲学社会科学	318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491
文化 新闻 出版	324	关于成都市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文化	324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新闻	331	(1986年4月16日在成都市第十届人	
出版	334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500
卫生 体育	335	关于成都市1985年财政决算和1986	
卫生	33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体育	341	(1986年4月16日在成都市第十届人	
劳动工资 人口 人民生活	344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504
劳动工资	344	“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	
人口	349	和主要指标	
人民生活	351	(摘自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区县分述

东城区	353	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西城区	361	(摘自中共成都市委《1986年工作安	
金牛区	369	排》第二部分1986年2月27日)	510
龙泉驿区	377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	
青白江区	385	于进一步完善市领导县体制,推	
金堂县	394	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	511
双流县	403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机械工业局	
温江县	409	《关于实行行业管理意见的报告》	
郫县	416	的通知	514
新都县	421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省政府	
彭县	430	《关于搞活100个大中型重点企	
灌县	437	业的通知》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516
崇庆县	445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经委《关于	
大邑县	452	对我市军工企业进一步贯彻军民	
		结合、以民为主方针有关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	517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意见	518	企业的意见》的通知	535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计委《关于开展我市协调运用经济杠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519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蔬菜产销工作的通知	536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城乡集体企业的若干规定	520	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成都市对外经贸工作会议关于扩大出口创汇问题的讨论纪要》的通知	538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和省政府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补充意见	522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金融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539
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成都市国营企业固定职工退休基金统筹试行办法》的通知	524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意见	525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以畜禽为主的多种经营生产的意见	528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农委《关于我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安排意见》的通知	530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全面清理乱占耕地加强土地管理的通知	531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财办《关于1986年商业流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532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财办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放开国营小型商业			

1986年纪事

1—12月主要事件及活动	541
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556
围绕经济建设积极开展共青团工作	560
提高妇女素质服务经济建设	561

附 录

分类统计	563
机构设置	580
建立友好关系的城市(地区)	587
经济技术学会协会研究会	587
普通高校经济类专业	588
获奖名单	589
部分企事业名录	606

经济地理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地处东经 $102^{\circ}54'$ 至 $104^{\circ}53'$ ，北纬 $30^{\circ}05'$ 至 $31^{\circ}26'$ 之间，东南、东北与内江、德阳两市接壤，南部、西南同乐山市、雅安地区相邻，西北和阿坝藏族自治州连界。市辖东城、西城2个城区，金牛、龙泉驿、青白江3个郊区，金堂、双流、温江、郫县、新都、彭县、灌县、崇庆、大邑、邛崃、蒲江、新津12个县。全市土地面积1239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2.2%，人口87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48%，是四川省人多地少、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地区。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成都市自然条件优越，热、水、生物等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地貌类型较多以平原为主区域差异显著】

成都市位于成都平原，西跨盆地边缘山地，东连川中丘陵，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龙门~邛崃山之南段雄踞于西北部，地势高亢，山脊线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西北部高、中山与东南部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为低山丘陵，海拔为800~1000米；东南部几乎全是平原，即成都平原的主体部份，地势平坦，海拔为450~750米。平原的东部边缘由龙泉山自东北向西南斜贯，山顶海拔650~1000米，其东侧为川中丘陵之西缘。全市地形较复杂，山、丘、坝兼而有之，但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40.1%），山地次之（占32.3%），丘陵最少（占27.6%）。这种以平原为主的地形，有利于农田垦殖，发展机械化和水利灌溉，也有利于工矿企业的选点布局和交通道路的规划建设。同时，多种多样的地形，又为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热量丰富日照偏少】成都市地处亚热带纬度范围，除西北部一部分地区地势高寒外，热量资源相当丰富，年平均温度 $15.2\sim 16.7^{\circ}\text{C}$ ，无霜期达270~300天，不仅宜于各种粮食作物和一般经济作物的生长，而且年可两熟有余。热量的季节分

配特点是：冬温不低，春季回暖早，夏温高而无酷暑。这对大、小春作物的生长，都是极为有利的。但秋季气温下降过快，9月下旬即可出现日均温低于 20°C 的情况，从而对晚稻的抽穗扬花带来不利影响。

成都市因阴、雨、雾日多，年日照时数仅1100~1400小时，是全国日照时数最少的地区之一，年总辐射量也只有83~95千卡/平方厘米，这对作物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是不利的。好在其60%以上的日照时数和总辐射量，都集中在夏半年作物主要生长季节，使光能利用率可以相应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总量不足。

【水资源总量较大季节和地区分配不均】成都市年降水量900~1300毫米，是四川降水量充沛的地区之一。全市地表自产径流量89亿立方米，岷江过境水量144亿立方米，地下水可采储量31亿立方米。就水资源总量来说，足以满足全市近期和远期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环保等用水之需。而且水、热同期，高温季节亦是多雨季节，对植物生长非常有利。但是，由于水资源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而大气降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区上的分布都是极不平衡，因而产生水资源供需上的矛盾。冬春两季降水少（只占全年的17~20%），河川径流量小，以致大多数水电站因此不能正常发电，工业、生活、农灌等用水非常紧缺，尤其是东部低山丘陵区，时有干旱发生。夏季降水集中（约占全年的55~62%），河川径流量大，常带来洪涝灾害，特别是位于河流汇合处的新津、金堂两地，几乎每年受到洪水威胁。

【生物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成都市是四川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全市高等植物种类达2735种，占全省总种数的32%，主要资源动物237种，占全省的20%以上。目前，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46种，占全国保护对象的13%，著名的有银杉、珙桐、水杉等；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24种，约占国家保护对象的25%，其中以大熊猫、牛羚、金丝猴等驰名国内外。同时，动、植物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特别是森林资源、珍稀动物集中分布于西北部山地，而经济植物、农田

作物、花卉和家养动物等，又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平原丘陵，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生物资源类型区。

【矿产资源种类较多绝大多数储量很小】 全市目前已发现矿产40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共有22种。而储量较大、并在省内占有一定地位的是钙芒硝、蛇纹石、石灰岩和水泥粘土。尤其是钙芒硝，其保有储量达97亿吨，占全省的98.8%，集中分布于新津，交通方便，开采条件优越。蛇纹石保有储量为5104万吨，占全省的91.4%，集中分布于彭县。石灰岩保有储量占全省的13.1%，主要分布于灌县、彭县。除上述几种矿产储量丰富、分布相对集中外，其余矿产资源却相当贫乏，特别是铁、铜、铝、铅、锌等主要金属矿的储量，均不及全省的0.7%，煤炭的保有储量也只占全省的1.43%。同时，多数矿产品位低，分布零星。

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布局

成都市是四川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稠密，城镇发达，交通方便，为四川第二大综合性工业基地和最重要的商品粮、油菜籽、生猪生产基地。

【农业】 成都市是全省最重要的综合农业区之一。在农业用地中，耕地比重大（占全市土地面积的37.4%），林地次之（占26.7%），牧地最少（占3.1%），水域有一定面积（占6.6%）。全市现有耕地707万亩，其中田占耕地的75.1%，土占耕地24.9%，平原中心的温江、郫县，更是膏一色水田。由于境内河渠密布，并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比重达84.4%，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1.24倍，是四川农田水利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占种植业产值的2/3，占全部耕地的3/4。在粮食作物中，以水稻、小麦两种分布最广、产量最大，合占全市粮食总产量的87.3%。成都市是四川水稻集中产区，水稻在各种粮食作物中单产最高，产量占全市粮食总产量的64.7%，绝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东南部平原地区，种植面积在50万亩以上的有双流、彭县、崇庆等县。小麦是粮食作物中发展最快的作物，占粮食总产量的22.6%，广泛分布于全市各地，尤以双流、金堂、彭县、崇庆等县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目前，按农业人口平均占有粮食553公斤，全市粮食商品率为20%左右，是四川也是全国著名的粮食高产稳产区。

经济作物有油菜籽、花生、棉花、甘蔗、烟叶、大麻、药材等，种类较多，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5%（茶、桑、水果未计算在内）。其中，油菜籽种植面积最大，向来占经济作物面积的80%以上，是四川最大的油菜籽生产基地，商品率为70%左右，每年都大量向外调出。主要分布于平坝浅丘区，以田种为主，多种于两季田中。除油菜籽外，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不大，但有些特种作物，如灌县、崇庆的川芎，双流的玉京，温江、灌县、崇庆的大麻，新都的晒烟，金堂、蒲江的柑桔等，虽为小宗，却在省内占有重要地位。

其它农作物以蔬菜为主，其种植面积90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2%，广泛分布于全市各地，而以金牛区环城一带为集中产区，是成都市蔬菜供应基地，蔬菜品种达100多种，为全国蔬菜品种最多、单产最高的地区之一，一年四季都有蔬菜上市，旺季有大量蔬菜调出。

畜牧业发达，猪、水牛、山羊及兔、禽、蜂的饲养量都较大。彭县、新都、崇庆、郫县、邛崃、灌县、蒲江等县为全省重要的商品猪基地县。由于蜜源丰富（主要是油菜花），养蜂较普遍，蜂蜜产量占全省的1/3，为全国重点蜂蜜产区之一，鸡、鸭、鹅、兔饲养量也很大，均占全省的10~20%，在各市、地中名列前茅。家畜、家禽的生产，基本上能够满足全市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

林业是薄弱部门。森林少，覆被率低，地区分布极为不均。全市森林覆被率只达12.6%，西北部山区复被率在50%以上，东部低山丘陵覆被率为12.7%，中部平原覆被率不及3%。现有森林面积中，用材林占63%，次为防护林、经济林、竹林、薪炭林等。用材林以天然次生林为主，大邑、灌县、邛崃、彭县、崇庆5县木材蓄积量占全市80%以上。防护林主要为西北高山区（江河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及西部深丘、东部龙泉山地区的水土保持林。经济林以柑桔、苹果、梨等果树为主，次为茶树、桑树和木本油料（油桐、油茶、核桃）。在山区积极发展水源涵养林和用材林，丘陵区重点发展多种经济林木，平坝区则着重“四旁”植树、绿化环境，是成都市林业发展的一项长远任务。

水产在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有较大发展。水产生产以人工养殖居绝对优势（占97%），天然捕捞比重很小（占3%）。金牛、龙泉驿、双流、新津、邛崃、郫县、新都等区、县，池塘、水库既大又多，水源条件好，养鱼技术水平高，养殖产量约占全市的80%，成为成都市鱼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

【工业】 成都市是中国战略后方的腹心，解放以来即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工业发展很

快。工业结构从原有以轻工业为主(占89.7%),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发展为目前以重工业为主(占55.2%),部门比较齐全,拥有多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地区分布日趋均衡的工业体系,已形成为西南地区主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城市现状工业结构,按工业产值计顺序,以机械、冶金、化工、食品、纺织为5大支柱,合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7%。

机械工业是成都市工业体系的核心。以电子工业、动力设备、金属切削机床与锻压设备、汽车、飞机、拖拉机、建筑机械等基础较好,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地区分布上,大中型和骨干企业主要集中在市区和郊区。东郊和东北郊是电子工业制造中心,西郊以航空工业为主,北郊以汽车、拖拉机制造为主,其它机械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北郊、东南郊。新都、灌县、双流、彭县,也是成都市机械工业的重要基点。

冶金工业以黑色金属的炼钢、轧材为主,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成都市铁矿资源十分有限,轧材、轧管所需钢坯、钢件主要由攀枝花钢铁公司调拨,铁矿石主要来自西昌。目前已形成以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包括成都钢铁厂、成都冶金实验厂、成都冷轧钢厂、成都铸钢厂、成都异形钢管厂、成都粉末冶金厂等地方企业组成的全省钢铁基地。其中,成都无缝钢管厂的钢管产量已达全国的1/4,是我国三大无缝钢管制造中心之一。

化学工业是成都市迅速发展的新兴部门。目前已形成了化肥、基本化工、有机化工、日用化工、化学药品、橡胶加工、塑料加工等行业。其中化肥生产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产值占全市化学工业的40%以上,产量占全省的1/3,是四川两大化肥生产基地之一,以青白江区大弯镇为最大生产中心,其次分布于新都、彭县、邛崃、大邑、新津等县。化学药品、塑料加工、日用化工的生产基础也较好,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区和近郊。按全省的统一布局,成都市也是全省精细化工生产中心。

轻工业以食品工业为主,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是成都市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主要包括屠宰及肉类加工、粮油加工、卷烟、酿酒和罐头加工等。重点和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布局在市区和郊区。其中,红星北路的成都肉联厂,年生猪屠宰能力达100多万头,是四川重要的肉类加工厂之一;东安南街的成都烟厂,年产卷烟能力达15万多箱,是四川5大卷烟厂之一;东郊沙河铺的成都罐头厂,罐头加工生产能力上万吨,是四川最大的罐头加工厂之一。各区、县布点的企业,主要是粮油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酿酒3个行业,其中以双流、彭县、崇庆、邛崃4县较为发达。

纺织工业是轻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棉、丝、针织、化纤等兼有,以棉纺织工业居绝对优势,主要分布于成都市郊、金堂等地,其中成都东郊的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是全省最大的纺、织、染联合企业,全市所产棉织品主要供应川西地区。丝绸纺织以织绸为主,为四川重要产区之一,历年丝织品产量占全省的1/5,以市区为生产中心,其次是双流、新都、邛崃等县。

成都市能源蕴藏量不丰,能源工业发展相形落后,成为影响工业生产能力充分发挥的限制因素。目前能源工业以煤炭生产为主,主产于大邑、崇庆、彭县等地。电力工业以火电为主、水电其次。成都热电厂为最大的电厂;装机容量12.5万千瓦。较大的水电站(5000千瓦以上)有彭县官仓、大邑大飞水、邛崃天车坡、灌县羊子口等。全市可供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为65万多千瓦。目前利用率约为16%,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交通运输业】 成都市地处全省政治中心的枢要位置,是全省各地、市之间的联系和通往全省各地的必经之路,因此交通运输显得特别重要。目前,成都已建立起一个以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为骨干的比较发达的交通运输网。

铁路运输是成都市发展最快的交通部门。解放后铁路从无到有,先后建有成渝、宝成、成昆3条干线和成灌、彭白两条支线,密切联系境内和全省、全国各地。主要运输物资有煤炭、钢铁、非金属、矿建材料、水泥、木材、化肥、棉花、食盐等。成都北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客运中心。成都东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公路在成都市交通运输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北京至昆明、兰州至昆明和上海至拉萨3条国道经过成都。现以成都为中心,以川陕、川藏、成渝、成阿、成仁、成温、成彭、唐巴等8条省级以上公路为骨干的放射型公路网基本形成。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5142公里,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41公里,相当于全省公路平均密度的2.7倍,是四川公路密度最大的地区。主要运输物资有矿建材料、煤炭、钢铁、水泥、化肥、木材、粮食、轻工产品等。

航空运输发展迅速,成都双流机场已建成国内现代化的大型机场之一,是西南地区的航空枢纽,与北京、上海、沈阳、武汉、广州、南京、长沙、太原、兰州、西安、昆明、贵阳、桂林、拉萨等地均有直达定期班机,与重庆、西昌、南充、达县等地有省内地方航线。近年又增加了至香港的直达旅游包机。

城镇分布

成都市是四川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人口（不含农业人口，下同）比重达24%，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倍以上。城镇规模结构是大城市少，中、小城市缺，小城镇多。现有特大城市1个（成都市区），建制镇55个。全市有66%的城镇人口居住在成都市区。城镇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城镇密度较大，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0.44个城镇，为全省平均密度的3.83倍，是四川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但市域城镇分布也有差异，平原丘陵区城镇稠密，似满天星斗，山区城镇稀疏，且仅沿山沟道路分布。

成都市除成都市区这一特大中心城市外，其主要城镇的分布情况是：

【灌口镇】 位于岷江出口处，成阿公路与成灌铁路之交点，系成都平原进入四川西北高原的咽喉重镇，是灌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有机械、精密机床、造纸等部门，为成都市重要的工业基点。附近有举世闻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及道教名山青城山，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区。现有城镇人口7.4万。

【大弯镇】 位于新都、金堂交界处，川陕公路、唐巴公路、宝成铁路之交叉地，是青白江区政府驻地。工业以化工、钢铁为主，系成都市重要的工业区。附近有明教寺觉皇殿、文庙、武庙、八

阵图、彭家珍祠等名胜古迹。现有城镇人口6.1万。

【临邛镇】 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扼川藏公路之要冲，是邛崃县政府驻地。工业素以酿酒、制茶、织绸著称。临邛也是四川最早的4个文化古城之一，镇内有文君井古迹。现有城镇人口3.8万。

【新都镇】 位于成都市区东北部，地当宝成铁路、川陕公路线上，是新都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有机械、化工、轻纺、食品等部门。著名的宝光寺、桂湖等名胜座落于此，常年游人络绎不绝。现有城镇人口3.4万。

【赵镇】 位于沱江起点、唐巴公路上，是金堂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以冶金、机械、纺织、水果加工为主。附近的沱江峡谷及云顶山，是成都市风景名胜区之一。现有城镇人口2.7万。

【柳城镇】 位于川西平原中心，距成都市区19公里，原为温江地区行政公署驻地，现是温江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以机械、建材、轻工、食品为主。现有城镇人口3.4万。

【华阳镇】 位于府河与江安河交汇处、成仁公路线上，双流县第一镇，历来是成都南部丘陵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拥有机械、化工、纺织等工业部门。现有城镇人口1.9万。

此外，重要的城镇还有天彭、崇阳、晋原、郫筒、武阳、鹤山、龙泉驿等，它们分别是彭县、崇庆、大邑、郫县、新津、蒲江、龙泉驿等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炳康）

城市历史沿革

成都，素有“天府”之美誉。晋人左思在《蜀都赋》里说，即使把中原诸夏城市的财富加起来，也赶不上西蜀成都的无量财富。古人的这些绝唱，决非一般的溢美之辞，而是由它本身的天生丽质——沃野千里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美丽的神话传说、精湛的工艺技术和发达的经济等诸多因素而得名的，喻之为“天府”并不为过。

古蜀之谜

【古蜀考古文化】 从川西到汉中的广大区

域，古代称为蜀。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着多种部族和民族，均例称为蜀人。他们多来自西方高原的羌、氏族系，后来南迁岷山，又沿岷江上游向成都平原移动，辗转迁徙，选择定居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著名的、足以代表巴蜀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和巢居文化。如：广汉三星堆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不仅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青铜偶像、陶器和石器，而且出现了举世罕见的金杖和黄金面罩。在彭县竹瓦街、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和成都市区方池街、青羊宫等地，均发现过时代先后不一的、新石器时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近年来，在成都市区十二桥发掘出一大片约1200多平方米面

积的、相当于殷周时期的木结构“干兰”式房屋建筑遗址。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多处“干兰”遗址中，木质桩柱以上建筑构件和房屋形状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存，其建筑规模宏大，已是宫殿和聚落格局，应算是目前发现的成都最早的城邑。这种“干兰”式建筑来源于树上的巢居，据说有巢氏就是四川人，成都人就来源于古巴蜀这种巢居氏族。这种巢居和“干兰”式建筑源远流长，直到秦汉时期成都民房的栈居样式，甚至今日竹木结构的“楼居”和吊脚楼，都是巢居的遗风。巢居、笮桥（即绳桥）和栈道，是巴蜀巢居文化的三大特色，而古代的成都恰恰是这三种物质文化发展的中心。成都的“成”字，据研究，就是“干兰”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成都”一名的由来，实得于此。不过，上述成都地区的考古文化，其真实面目、它的发展序列和演进顺序，以及它同古蜀历史文化的关系，还有很多阙环和疑问，至今给历史学家留下的是一个难解而有趣的谜。

【古蜀历史文化的演进】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只朦胧地知道蜀人的远祖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等人氏及他们的一些扑朔迷离的传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真实事迹早在汉代就已如烟涛一样迷茫不清。不过，如果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古蜀远祖传说人物的名称和有关的神话，那么，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这些名称只是远古蜀人由原始采集、渔猎经济，演进到畜牧、农耕经济的一种部族序列或时代序列的代称。始祖蚕丛，即古蜀山氏，因蜀蚕（即蛱蝶）丛集而得名。蜀蚕是原始蜀人采集的主要食品之一，所以，“蚕丛”一名，实际是蜀人采集经济的象征。“鱼凫王败于湔山”，鱼凫是捕鱼的水鸟，败是败猎之意。所以，“鱼凫”一名，实际代表了蜀人渔猎经济时代。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杜主即土主，指农村公社的主神，这是农耕定居部族的代称。以上是古蜀的传说时代，还不能说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成都地区蜀人氏族制度的完结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世。传说杜宇禅位于其相鳖灵。鳖灵是荆人，死后其尸随青衣水上浮至蜀而复苏。他为蜀人治水有功，最早的都江堰灌溉工程，就是他领导完成的。他代替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杜宇失国后，隐居西山，其魂魄化为杜鹃鸟，常因思念故国而啼叫出血来。这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传，蜀人见杜鹃鸟过，都要肃立致敬，此风俗一直保留到唐代。这个美丽的禅让和失国的传说，犹如中原夏启破坏禅让制一样，表明了原始军事民主制为私有制君主代替的必然趋势。氏族制度走完了自己的历程，阶级文明应运而生。成都终于在开明王朝时

代升起了文明的曙光。

原始聚落的形成与成都 城市的兴起

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兴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先是聚落，继之演变为市，再兴筑为城。“市”的形成比“城”还早，“市”是城市形成的前身。古人说成都得名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实，这说的正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大约在蚕丛、鱼凫的采集、狩猎时代向杜宇农牧兼营时代演进的过程中，成都地区就出现了部落或聚落之间的原始交换活动，产生了最早的“市”。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这说明早从蚕丛时代起，蜀人就过着民无定居，随蚕迁徙的生活，部落临时聚居之处，即为集市。古籍记载杜宇、开明时代曾辗转在南安（今乐山）、广都樊乡和瞿上（今双流）、郫县、成都诸处选择“郫城”，这实际上是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辗转迁徙，企图寻找合适的、永久性的农业定居点的反映。由于交换活动的增加，特别是手工业者的聚集，这种临时设市，即逐步演变为固定的市邑和聚落。他们最早在小郫（今彭县）建市，继在大郫（今郫县）建邑。因郫邑低湿，常为水患所侵，于是又在邑外东界的赤里开拓出一个新的市场，这就是最早的成都市。最初市场聚集在西边的小城（即少城），以后又在东边建立大城。赤里的经济地位逐渐超过了原来的郫邑，遂成为大都大邑，开明尚“自梦郭移”，在这里建立了都城，并命名为成都。自此以后，成都才成为古蜀人的最大定居点，具有了文明城市的雏型。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灭蜀，以蜀王旧都一带置成都县。公元前311年，秦人按咸阳建制兴筑成都、郫城和临邛三城的城垣。成都城市在这一年才算正式建立。当时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共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太城，是蜀郡太守官舍区域。西为少城，是商业区，市张列肆，商业繁盛，设有盐、铁官管理盐铁税，市官管理市场，主收商业税。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是“陈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出现了在陇蜀两地长途贩运的商人阶层。到秦统一巴蜀后，这些商人多迁于蜀地，故秦惠文王要专门修筑成都少城来安置这些商贾。经过累代的经营，成都遂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之所，发展为秦汉时代有名的商业都市，到西汉末年更成为全国除

长安以外的商业五都之一。据说汉武帝时，樊道（今宜宾）令因未能开通樊道、青衣道而被使者唐蒙处死。临刑前，道令遗憾地说：“我在蜀作官多年，恨不见成都市！”唐蒙遂在行刑处仿造了成都市，再最后行刑。这虽系传闻，但却说明了成都市的“市”来源之古老及其地位的重要。

成都古代经济与文化 中心的形成

两汉、蜀汉及六朝，成都一般情况下是益州、蜀郡和成都县的治所。在公孙述、蜀汉和成汉割据时期，它又是都城。在此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成都城市经济和人口均得到长足进展。西汉时，成都县人口达7.6万户，约35万人，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东汉时，成都县发展到9.4万户，约40多万人，集中了当时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两晋时更占川西人口的60%，可见城市人口集中程度之高，为全国罕见，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第一次集中的高峰。随着人口的增殖，城郭也进一步扩大。在秦成都城的基础上，汉武帝扩修为成都郭十八门。此后2000多年，成都城的城址和城市的基本格局基本没有迁徙，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这在全国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成都同苏州，是中国两个仅有的最古老的城址没有变动的城市。

【汉魏六朝时期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两汉时期，成都逐步形成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政策放宽，成都不少坐贾改从“周流天下”的行商，在汉政府“开蜀故徼”（开放蜀地西部边境）政策的鼓励下，“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牛、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也为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农产丰饶，李冰在秦庄襄王时兴筑都江堰（汉名都安），开凿郫、流二江于成都和双流城南，给成都地区带来灌溉、行舟等多重经济效益，使成都地区很快发展为全蜀农业经济的中心，其繁华程度超过了素号“天府陆海”的关中，从而使得“天府之土”的专称，移到了成都头上，直到今天还用“天府”来形容四川。由于农业发展的结果，农、副、牧、土特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蜀地饶产蚕、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些东西都通过商品流通而运销全国，“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蜀地西南邛笮边陲的土特产就是以成都为集散中心而流向中原和东海两越交趾之地的。据《史

记·货殖列传》记载，成都市场的影响范围已扩展于整个西南地区。“南御滇犍”，南边到了宜宾、贵州、云南，有犍僮奴隶买卖；“西近邛笮”，西边到了西昌汉源一带，有笮马、犍牛交易。北则通过褒斜道，使成都市场与长安相连接，成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的一部份。

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中心部份。汉代成都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在全国都享有盛名。秦迁赵人卓氏、山东人程郑氏于临邛，“用铁冶富”，到汉代成为巨商大贾世家。临邛的铁器远销云南和东南亚甚至罗马，考古上屡有发现。蜀地并盐闻名全国，“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成都市郊、北郊羊子山和郫县均出土有《盐井》画像砖，广都有盐井数十所，说明煮盐的普遍化。西汉成都人罗衷以深达50丈的西州盐井致富，资金达千万，说明深井技术的高超。临邛一带盐井的开凿，往往气（天然气）、油（石油）同时井出，有的就利用它来煮盐，称为“火井”，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然气、石油最早开发的记载。汉代齐陶、充豫和成都都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而尤以蜀地为最盛。成都是锦缎的故乡，是缎的发明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汉之布，亦民间之所为耳”。这说明当时的成都，不仅官府丝织业著名，而且民间手工业生产的普通纺织品也已行销全国。成都土桥东汉画像砖画像上有足踏织锦机和织布机各一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比欧洲脚踏织机的发明早数百年。尤其是蜀锦，当时就驰名于中外。到三国时期，著名的蜀锦是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山谦之《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这说明江汉地区原来是没有锦的，是靠蜀锦才开辟了魏吴市场。到刘宋时，进一步在丹阳创设锦署，把蜀中工匠百人迁到丹阳，这才使江汉和东南丝织业发展起来。当时全国市场对蜀锦需求量很大，刘备入蜀一次即赐诸葛亮、张飞、法正、关羽锦缎各千匹。曹操曾经常“遣人到蜀买锦”，甚至蜀中的下等纺织品叫“蜀薄”的，也能在当时中原地区行销。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汉政权偏处益州，其军需国用主要是仰赖于锦的税收。所以，成都成为魏晋时代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中心，不仅城市内家家有人织锦织布，“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而且蜀汉政府还专门在城南修筑锦官城，聚集工匠，进行官营织锦业的生产，故后人称成都为锦里，又叫锦城，名锦工濯锦之江为锦江，可见汉魏时代斯业盛况。在当时成都的市场上，除成都的锦外，著名的檀华（木棉）布、黄润布（即白紵布）和“织成锦”，可制轻盈的袈裟，为人们普遍

喜爱。还有西边氏人的殊缕布（今之条纹布）、哀牢夷的阑干（纒）、帛叠（绵布）、罽毼（毛织品）、蜀縠（细布）、广汉七缕布等各种纺织品。其织锦之精巧，工艺技术闻名全国，“殊锦雕缕之妙，殆牟于上国”。蜀锦后来成为三大名绣之一，就是汉代奠定的基础。在漆器制造业方面，早在战国时代，成都就开始制造漆器。到汉代，成都漆器有著名的“金错蜀杯”、“蜀汉扣器”，这是带有金银丝镶嵌的漆器，主要产地是蜀郡和广汉郡，其流通范围则遍及国内外市场。从考古发掘中，已知四川青川县、梓潼县、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墓，均出土有“成市”、“成亭”、“成市草（造）”烙印的漆器，其质量之美已震惊世界，这是汉代成都市府管理的手工作坊的产品。在贵州省的清镇、朝鲜平壤发掘的王盱墓、蒙古的诺音乌拉等地均发现印有汉代“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广汉郡（今梓潼）工官”等铭文的错金银扣漆器。这说明汉代成都的漆器制造业已相当兴盛，其产品远销江汉、滇黔、蒙古和朝鲜。与此同时，成都郡、广汉郡和雒县（今广汉）三地工官还制造精美的“金银器”，即镀金、银的铜器，也很著名。

除此以外，张骞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境）看到蜀布和邛竹杖，这是蜀商人同身毒（印度）交换的产品，身毒又转销大夏。番禺令唐蒙曾在番禺（今广州）吃到蜀枸酱，这是蜀同夜郎国，通过牂牁道交换的产品。这些事例说明当时成都商人已开辟了远逾昆明、永昌、八莫（缅甸）、阿萨密和印度以及直抵番禺的几条商路，这是除北方西域丝绸之路之外的另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而成都正是这条商路的起点。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成都从出现市邑到发展为巴蜀乃至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两汉时期才最后完成。到魏晋时期，成都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与广都、新都并为三都，号称名城。而这时的成都市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喧呶鼎沸，嚣尘张天”的繁华程度。

【成都古典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也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在城市工商业和川西农业基础上迅速形成并充满生机活力的时期。西汉景帝时，太守文翁“修学官于成都市中”，并选派学生从学于京都。文翁创办学校的地址在今石室中学，这是汉代郡国办学的开始。从此改变了“蜀左官，无文字”的落后面貌，通过中原文化的熏陶，使蜀学得到飞跃的发展，出现了汉文学的蜀中四大名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遵。他们“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司马相如是汉赋定

型化的奠基者，代表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严君平以易学和老子学直接影响了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创立天师正一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成都是汉大赋的故乡，是道教的发源地，是古天文学的一个中心。在古典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成都是古代西南的文化中心，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成都是益州、蜀郡，成都府和成都县的治所，又是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的所在地。府、州之名曾有更易，但成都县一名始终未变，治所均在成都。这时，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都大大发展。成都城市人口达10万户，计58万人口，占当时成都府16县总人口的70%，这是成都城市发展史上人口第二次集中的高峰。因人口增殖，成都城区被分为两个县治，贞观十七年于成都县之东偏，置蜀县（乾元元年改为华阳县）。从此一城两县治，继续了1000多年。成都和华阳两县都是当时全国85个望县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县。而“望县”是按户口多少来区分等级的最高的一级县，故成、华两县实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县。由于城市人口的增殖，突破了原有城垣的框框，加上防御南诏的需要，唐代后期，西川节度使高骈曾大力扩大原有城池范围，修筑了“周二十五里”的罗城。

【唐宋成都的农业与手工业】 在唐代，剑南西川是全国诸州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唐朝的重要财源地，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入成都，唐僖宗也因为黄巢义军所逼，再度入蜀。这两度入蜀，都刺激了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除原有蚕丝、织锦和各种手工业品得到继续发展外，印刷术也发展起来。根据有关文献，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唐代成都印刷品已有了“西川印子”的专称，当时就流传日本。现存唐代成都印刷品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残页、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印刷品，而卞家、过家等书坊，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民营出版社。唐代广都（今双流）的麻纸素享盛名，为官府文书所采用。薛涛制笺达十色之多，为文人雅士乐用。成都的瓷器也在此时发展起来。今青羊宫地区曾出土大量瓷器和隋唐窑址。双流县牧马山、郫县横山子、灌县玉堂公社、彭县磁峰公社均发现唐宋青瓷和白瓷的窑址。《景德镇陶录》说

蜀窑瓷“体薄而坚緻，色白声清，为当时所重”。杜甫诗曾盛赞大邑瓷碗“轻且坚”，“白胜霜雪”。唐代邢窑的瓷器与邢窑、定窑、越窑、景南窑、潮州窑齐名，为唐代著名瓷窑。这说明隋唐时代成都窑瓷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曾盛赞当时成都罗锦之丽，伎巧百工之富，大大超过了扬州，应该算“天下第一名镇”。事实上也是如此。安史之乱中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廷收入主要靠成都地区，当时益州的财赋收入已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东南地区。在中原残破的时候，唐王朝主要靠剑南西川的财力作其统治支柱，由此可见成都在唐朝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五代时，成都先后为前蜀王建、王衍，后蜀孟知祥、孟昶两个地方政权的首府。后蜀主孟昶曾扩大成都罗城为羊马城，命遍种芙蓉树于城垣之上，秋季盛开，花团锦簇，成为长达数十里的花的环带，故成都城因此而得了“芙蓉城”（或称“蓉城”）的美名。两宋时代，成都为川陕四路的首府，置成都府路成都府成都县，三级行政区划均以成都二字命名，并均以成都城为治所。元代设四川行中书省，初治重庆，后移成都。但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并无更易。

宋代时期，成都古典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平蜀，曾将成都锦工数百人迁到京师（今开封），设机棉院，宋锦技术因此而得到飞跃发展，冠绝古今。宋神宗时，四川制置使吕大防在成都设立锦院，建立锦楼，募军匠500余人织造，专门供给皇室。到南宋，成都锦场发展到3处，并设锦文局管理，规模甚宏，产额益丰，花色繁多，殆极一时之盛。除官营织锦业外，私营织锦也很发达，陆游《游蜀记》曾说：成都有九壁村，是出美锦的专业街道，称为“九壁锦”。向官府上贡的丝织品中，绫出于成都、华阳、新都、新繁、郫县，罗出于广都、双流、温江，丝出于郫县，柞蚕丝出于犀浦，衫缎和高抒布出于新都，至于绵绵绢布麻则成都府县皆出，可见宋代丝织业之盛。陶瓷业中，彭县发现宋代瓷窑，纹饰质地都有新的发展，尤其是莲花纹饰青瓷为人们所喜爱。雕版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北宋前期，成都进行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府出版工作。北宋太祖开宝四年，朝廷命高品宦官张从信在成都监刻《大藏经》5千卷，历时12年，共雕版13万块，世称“开宝藏”，现北京图书馆有残卷，已成稀世奇珍。当时曾流传高丽、日本、越南等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皆有蜀刻本。除官府刻书外，私人刻书也很发达，成都人彭乘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刻书家，“蜀中所传书多出於乘”。成都费氏家族所刻书，世称龙爪本，为时人称羨。蜀刻本字体肥劲朴

厚，版式疏朗悦目，纸张洁白，墨如点漆，校勘精审，颇具特色。“宋时蜀刻甲于天下”，蜀刻在宋代始终居于全国中心地位，对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唐宋成都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据《茅亭客话》等书记载，唐代后期和两宋时期，成都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的束缚，而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手工作坊）的格式，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和北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每年正月至十二月，还有各种专业性的临时市场。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大慈寺、石犀寺、市桥等地就是当时这些临时集市的所在地。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甚或有通宵达旦者，夜市的传统一直流传到清代直至今日。唐宋时期，旧城区几次扩大，在大慈寺以东还开辟出了新的东市商业区。从西南地区范围看，成都还是西南边陲和岷山、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皮毛、竹木等土特产的集散地。特别是茶马贸易，以川茶、蜀锦向西北易马，政府非常重视，在成都设专司管理。直到明清，这种以内地茶盐同边陲少数民族土特产相交换的贸易，还相当盛行，这既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黑、红双色套印印刷术的发展，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交子”，以代替铁钱，这是唐代交易信用卷“飞钱”的发展，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

【唐宋成都古典城市文化的鼎盛】 到唐宋时期，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鼎盛阶段。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刺激，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化艺术与游赏习俗相结合的新的趋向。“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的文化内容的专书《岁华纪丽谱》，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孟蜀石经、蜀刻本、蜀笺、蜀锦，皆被当作艺林瑰宝，有了专门研究它们的专著著作。文学方面，李白、杜甫、陆游在成都的诗作体现了漫游或流寓生活对蜀文化的新鲜感受。后蜀赵崇祚编辑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总集《花间集》，是城市文化绮怨浓媚生活的反映。唐代大慈寺壁画为唐代天下之冠，代表了成都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黄筌父子、李昇等人都是绘画卓越的艺术大师。在音乐舞蹈方面，渊源自古的巴渝舞曲演变而为富有蜀地特色的《竹枝》民歌，到明清进一步发展为竹琴清音和川剧高腔。隋代雷威是制造雷琴的大师，至今其琴还

留存于世。具有巴蜀特色的“蜀国弦”音乐，吸收了龟兹、南诏、黔国等地音乐的特点，编组了新的以龟兹乐为主的乐队（如王建墓棺床所刻24乐伎浮雕），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天上”的宫廷音乐进入了“人间”百姓家，造成了“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盛况，甚至使成都城市“管弦歌舞之盛”超过了扬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成都的西园和西楼，既是游乐的风景区，又是文人荟萃、吟诗作文的风雅地，苏轼所书西楼帖，至今传为国宝。成都城内外有众多的寺庙，往往成为游乐的中心，太守和众官吏往往带头在大慈寺等地游乐吟诗，与民同乐。这种活动称为“邀床”，太守则被称为邀头。这种游赏习俗的艺术化，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极盛的重要标志。

明清时期成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成都分别是四川布政使司和四川省的首府，又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的治所。明末清初，从崇祯七年到康熙二十年共47年间，由于频仍的战乱，成都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颓墙废堑，虎迹纵横”，整个城池成为一片废墟，户口凋残，人口多向秦陇和荆湘外流。从康熙到乾隆，对四川实行移民实边，鼓励垦荒占田的特殊政策，吸引了关陇和湖广地区的大量移民，土著劳动力也得到稳定。加上川西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强化了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条件的紧密结合，使川西平原的农业经济和成都的城市经济再度得到回升。到乾隆时期，成都地区经济和人口又达到了新的高峰，城市人口为11.8万户，59万人。到宣统年间，成华两县人口达到85万人，城市人口占了城郊总人口的58%，这是历史上成都城市人口第三次集聚的高峰。

【明清成都的城市经济】 明清时期，成都经济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全国八大商业都市有京、杭、苏等，却没有成都，远比不上汉唐五都之时。传统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而苏、浙崛起，后来居上，竟一跃而为全国织造中心。尽管如此，明清成都工商业仍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当时成都市场上有特色的还是工艺美术产品，“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蜀锦一缛的市场价格是50金，但明清蜀锦已不可作衣服，仅能充茵褥之用，故民间很少制作，只有官府才有此项工业。蜀杉木有抬山板、双连板等名贵建筑木材，来自岷山千年古木，沿岷江水运出川，享有盛

名，蜀地商人用以同苏杭的文绮锦绣、山珍海错等珍贵货物相交换。蜀扇已能制作折扇，这是明代才从国外传来的技术，而成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所制精美蜀扇，明政府列为贡品。钱谦益曾以蜀扇赠送清豫亲王多铎，足证蜀扇为当世所珍。造纸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明玉珍占据成都后特设笺局，派他管理，并让他“搗锦于浣花”。这时的薛涛笺已用芙蓉皮为料，加入芙蓉花末汁来制作，其色鲜美，超过前代。此外，成都市场上还流通徽纸、池纸、竹纸，“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纸比川牋价贵三倍。”

【明清成都的城市文化】 明清时期成都城市文化的特点是有“川味”特征的下层群众文化的兴盛，其最高成就是川剧艺术。川剧源于元北曲和明南曲，形成于清代后期。乾隆年间，金堂艺人魏长生在四川、北京和扬州演唱秦腔，所饰花旦，名倾全国，被誉为“一世之雄”。他所创的“四川秦腔”直接演变为今日川剧的弹腔。川剧的高腔、弹戏、胡琴、崑曲和灯戏等五大声腔艺术，就是通过历代艺人的努力而趋于完善的。

明清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成都主要是书院的兴起。明代成都有子云书院、大益书院、浣花书院，清代有锦江、墨池、芙蓉、潜溪等书院，其中以尊经书院最为著名。同治年间，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除教授诸生外，还建有尊经阁，专门用来藏书。设尊经局，专门印刷经史诸书。光绪年间，丁宝祜主持书院，聘著名经学家王闿运为山长，培育出中国旧时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家廖季平、改良思想家宋育仁、文学家吴之英、张森楷等驰名海内的学者。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也是尊经书院的学生。郭沫若、蒙文通、吴虞等近代学者，其师承都与尊经书院有直接渊源。尊经书院为近代四川文化的发展和勃兴，培育了大批人才。

成都茶馆和书场，素来为人所称道，这是成都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蜀人饮茶溯源自古，汉王褒《僮约》即有“武阳（今新津）买茶”的记载。晋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茶冠六清”，这些是成都人饮茶习俗的最早记载，它在全国都是最先形成的。饮茶的茶具有盖碗和茶船，据说承碗的茶船是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创制，这是成都人特有的饮茶方式。从清代直到现在，茶舍、茶亭、茶厅散布全城，数量之多外地所罕见。书场是成都城市群众消闲的另一场所，一般书场都兼营茶舍。书场内有评书、扬琴、清音、竹琴、金钱板等各种曲艺表演。其中评书尤为群众喜爱，早在东汉说书就很盛行，成都有东汉说书陶俑出土，生动地表现了“负鼓盲翁正作场”的形象。

既丽且崇的历史名城

晋人左思《蜀都赋》说：“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这句概括性的话，表达了古代成都的形象就是美丽和高大。在历史上，成都是座江桥众多、水网密布、树木葱茏、繁花似锦的“花城”。“花重锦官，蔚为香国”是历代诗人吟咏成都美色胜景的中心内容。秦汉时代就已具有的“带二江之双流”的城市格局，现在还依然延续着。古城层城华屋，被叫做“重城”。民间居室建筑多为灰瓦白墙和茶褐色檐柱，表现出淡雅古朴、明快幽静的风格。公元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因仰慕西南的明珠——成都城的风格而为之心醉，19世纪法国的旅行家古德爾孟曾赞叹成都城是“东方的巴黎”，是座“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

成都又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西晋末年，成汉国在这里建立了多民族的农民政权。南朝宋文帝时，在这里爆发了梁昱、程道养反暴政的起义。北宋淳化四年，发生于青城的小波、李顺起义，以成都为都城建立了大蜀政权。清顺治元年

至三年，张献忠的大西国农民革命政权，定成都为西京。辛亥革命期间，成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发源地。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导，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杂吟》中写道，“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成都人民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次高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矗立在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保路烈士用鲜血铸成的丰碑。“五四”运动前夕，成都曾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星期日”周报，宣传新文化运动。新繁人吴虞发表了反礼教的檄文，在成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誉为“四川支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老一辈的革命家王右木、吴玉章等人，为成都创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了英勇斗争，不少仁人志士也在这里为党的事业奋斗。

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早在1921年时就有把城地区域改为成都市的建议，但迄未实行。1928年把成都、华阳两县的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成、华两县只辖乡区。这一大变革，改变了1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市向近代化迈进的开始。

(谭继和)

近代经济简述

成都的近代经济状况是同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成都位于群山怀抱的四川盆地西部，在近代除了东有长江和外界沟通外，其它三面基本上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导致成都地区以耕织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相当顽强，植根于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主的传统工商业，占据着城市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民族资本的产生则比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要晚20年，且规模狭小，发展缓慢，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企业不多，直到解放前夕，成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鸦片战争后的社会经济

早在汉唐时期，成都就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喧然名都会”，素以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著

称于世。明清以来，国内经济重心转移到江南各省，成都在国内的经济影响逐渐减弱。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闭关锁国的政策被冲破，门户洞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随之大量涌入，沿海沿江城市日趋繁盛。地处内陆的成都，交通不便，经济地位大大下降。但是，由于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全省的财政收支，大部分在此汇聚；众多军政文教机构和它的人员消费，以及附近几十个富庶县区人民的许多生活用品，都仰赖成都的市场供应；四川大半个省区土特产的聚散，也都集中于成都，加之成都手工业产品丰盛，手工业者队伍庞大，因此成都在省内的经济地位，除重庆外仍居前列，它的工商各业仍具有不小的规模和潜力。而另一方面，成都的土地高度集中，官僚地主势力根深蒂固，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地理和交通等诸因素亦限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缓解了外国商品的冲击

力,使成都的自然经济结构保存着既落后又顽强的生命力。致使19世纪中叶,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掀起了以“求富”、“自强”为目的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浪潮,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波及到成都。当时新擢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楨于1877年在成都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业——四川机器制造局,就是洋务运动在四川和成都的唯一成果。虽然它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的创办使成都出现了最早的产业工人,客观上刺激了成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19世纪90年代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及这次战争强加给中国的《马关条约》,是成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成都社会开始发生了有近代社会特点的急剧变化。日本强迫在重庆开埠,设领和划定租界,打开了四川的大门。外国列强继而夺取川江航权,开办洋行、公司,资本和商品双管其下,使成都的社会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在商品流通领域,肥皂、洋油、火柴等洋货逐渐占据成都市场;洋纱、洋布、洋绸缎、洋染料等则以其质高价廉的优势,取代了传统商品的地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还在成都地区加紧收购土特产品,大量掠夺工业原料。随着洋货的大批涌入和作为工业原料的土特产品的成批输出,列强的势力在成都逐步渗透,日渐严重地破坏了成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迫使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20世纪初年,成都的近代商品市场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的增加而逐步形成,成都开始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成都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缓慢地发展起来。

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1905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外国列强无暇东顾,以及国内反帝运动日益高涨等原因,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成都的绅商开办了一些投资较少,技术水平不高,见效较快的企业,以火柴、织布、造纸、印刷、肥皂等行业为主。

在火柴业方面,1906年,成都商人集资4.4万元,创办了惠昌火柴厂。

在织布业方面,1908年,樊孔周集资1.5万元、织机40余台,创办了因利纺织厂;1909年,有5000元股金的新华布厂开办;1911年,吴永泰帆布厂开工生产,拥有6000元股金、木机10台。

在造纸业方面,1906年,商人朱秉堃集资10万

元,创办乐利造纸公司。

在印刷业方面,1908年,成都相继开办照相楼印刷厂、成都图书局、正谊有限公司等印刷厂。

在肥皂业方面,1908年,由商人集资1.3万元,创建了商办裕德肥皂厂。

此外,成都还创办了一些有一定规模的近代企业,比较有影响的是:1906年,尹德钧创办的成都自来水厂;1908年,由劝业道周孝怀集股白银2万两,开办的劝业场发电部;1909年,陈养天等集资30万元,创办的启明电灯公司;1909年,官商集资白银400万两,在成都开办的四川矿务总公司。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成都民族资本的大多数企业还处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变的过程之中,工商企业以中小型轻工企业为主,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企业不多。在城市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近代民族资本的势力极其微弱。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按专业行当组织起来的商帮达69个之多。其中,主要是绸缎、丝麻、湖绉、匹夹、皮货、帽铺、蜀绣、扇庄、靴鞋、古玩、药材、竹木器、油漆、晒蓆、柴炭、盐号、酱园等行业。行业之间分类细密,各有行规,各有公所,一定的街道,集中了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和商铺。例如: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打金街、打铜街、棉花街、纱帽街、署林街、丝棉街、红布街、搓布街、染靛街、油染街、糠市街、磨坊街、染房街、布袋巷、烟袋巷、灯笼街、簸箕街、豆腐街、刀子巷、珠宝街、珠市街、锣锅巷、杀猪巷、杀牛巷、鹅市巷、羊市巷、草市街……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专业街道名称,不仅体现了各手工行业和商帮的分工细密,而且反映出浓厚的封建宗法性。这种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各种商会、行帮广泛存在,表明传统的工商业仍占据着城市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成都的近代民族工业,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又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只能在夹缝中畸形地艰难地寻求生路。加之规模较小、资本拮据、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缺乏竞争能力,不少企业开办不久就因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排挤打击而倒闭。20世纪初年成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有了初步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时期

社会经济的破坏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进入了

民国时期。1913年，袁世凯的走卒胡景翼夺取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革命果实，使四川处于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继1916年7月护国战争在四川结束之后，由于川军增加，滇黔军滞留四川，又发生川、滇、黔军阀在成都的巷战，使成都的社会经济惨遭破坏。1919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为解决四川各军的军饷问题，于1919年4月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决定各军“就防划饷”，使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具体化。狡猾的军阀看清了有防区便有军费，有了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实力扩大，又可争夺防区。自1912年的“成都兵变”起，至1932年的“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止，共发生470多次军阀混战，川省几乎无岁不有内战，成都更是各派军阀觊觎争夺的中心。“兵愈打愈多，帅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合随战”，“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大小军阀更是苛捐杂税，借垫预征。1934年，刘文辉的24军1月1征，1年12征；田頌尧的29军，1年竟征14年的粮，灌县的田赋预征到1991年。这时四川田赋每亩的最高征额，约为外省4倍，较之日本，则为10倍；较之美国，竟达21倍。真是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兼之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使成都原有的手工业生产处于奄奄待毙的境地。新兴的近代工业，又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缺乏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投资没有保障，致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工商萎缩、社会购买力低下，大量社会财富毁于战火。近代在成都建立的官办的四川兵工厂、造币厂，亦为各派军阀你争我夺，破坏殆尽。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成都近代民族工业，由于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和防区制的阻碍，截至抗战前夕，仅存民办的启明电灯公司、四川制革厂、肥皂厂等，此外主要是手工工场作坊，且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凡属于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除土特产品外，均仰赖沿海城市和国外进口。

但是，辛亥革命以来，成都的商业和金融事业却畸形发展。自1924年杨森任四川督理，新建春熙东、南、西、北四段路，并拓宽主要街道后，市面逐渐繁荣。春熙路北接总府街、商业场延伸到提督街，南接东大街，形成了一个商业金融中心，银行、钱庄林立。特别是邓锡侯、田頌尧、刘文辉三军阀共管成都时期，银行、钱庄多达70余家。大小军政人员利用开办银行，吸收资本，从事商业和金融投机，并滥发执照，滥造劣币，扰乱市场，坑害人民，致使币制混乱已极，对成都市的人民生活、工商各业及社会经济，危害极大。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1935年以后，为祸甚剧的四川军阀防区制被撤销，川政统一，社会经济趋于稳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片领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治经济重心内移，沦陷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团体和文化界人士、难民，其中包括大批有产者及其家属多迁来成都。1940年~1941年，成都人口骤增至80余万人，迅速增加了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使一向仰赖省外输入工业品的成都，更感到物资匮乏，价格亦随之上涨。投资工业成为大有利益可图的事业，而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向成都转移，也为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在客观需求与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不仅内迁成都的工厂以高速度边建厂边复工，投资设厂者也风起云涌，不仅是内迁的有产者和内地的商业资本家、地主纷纷向工业投资，不少有经验的技工也合伙或独资办厂。由于学校、医院等文化设施和工厂、作坊迅速增多，金融业也日趋活跃，致使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当时，在成都筹建工厂的有数十家，而沦陷区的内迁工厂基于历史较长，资金雄厚，机器设备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管理较有经验等有利条件，迁到成都后产品很快就占领了市场。影响较大的工厂主要有成都裕华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成都宝星纱厂、民康染厂、华兴电机弹花厂、大星面粉厂等。

成都裕华纱厂是在武汉沦陷前夕，由武昌裕大华公司迁到成都的。他们采取边修建、边安装、边生产的办法，尽快组织生产。工厂生产的“金飞鸟牌”棉纱，“天马牌”棉布，由于质量好，在棉织品市场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厂在当时成都纺织工业中规模较大，人们称之为代表成都民族工业“三根半烟囱”中的“一根烟囱”。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成都宝星纱厂在经营管理上各有特色，产品比较讲求信誉，为成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1942年由浙江人董一峰创办的民康染厂在正式投产后，不仅为成都被服厂和空军被服厂染制大量军用色布，还利用其技术优势，生产出大量“阴丹士林”蓝布，创造了“民光蓝”的名牌布，远销广大农村。由于业务兴旺，开工不到一年就赚回了全部投资。这个厂的出现，开创了旧成都在染整行业方面采用近代染色技术的

新局面，被称为解放前代表民族工业的“三根半烟囱”中的“半根烟囱”。

抗日战争在成都创办的工厂和内迁的工厂，规模较大的为数不多，但它们为保证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需品供应和稳定成都地区人民生活、发展城乡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成都近代工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成都地区人口的增加，市场需求的扩大，同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成都的农业也有所发展，粮食产量逐渐增多。但是，由于抗战前线的大批粮食调自四川，加之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囤积投机，粮价仍然飞涨。1942年12月，成都的米价每石为4500元（旧法币，下同），到1943年1月，即涨到1.5万元，1月之内涨了3倍以上，广大农民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

解放前夕社会经济的衰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将日寇掠夺中国的财富通过“接收”据为己有，大发“接收财”。抗战期间，他们通过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独占丝、茶、桐油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几乎完全垄断了成都的百货市场；抗战结束后，他们又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等垄断组织，进一步控制了成都的纺织、植物油等企业；同时还在商业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兴风作浪，牟取暴利。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积极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增多，通货迅速膨

胀，致使成都在抗战后期一度下跌的物价又急剧上升。

对成都地区的民族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提供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具有的原料、能源供应和市场、运输、金融等条件，反而认为自产不如进口，全面投靠美帝国主义，把发展中国工业的希望，寄托在进口美国的机器设备上，大量削减原本不多的国内加工订货。加之美国利用种种特权，大量倾销剩余产品，冲击成都市场，又导致许多工厂倒闭。成都的纺织厂倒闭90%以上，毛织业78家工厂仅剩下6~7家勉强维持。抗战期间成都有卷烟厂327家，由于美国卷烟的大量输入，到1946年4月倒闭的厂家多达230家，至同年9月竟全部停工。

抗战结束后，成都地区的农业衰败，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劳动力被强征去打内战，使“农村耕种已大成问题”。国民党政府借兴修水利为名，向人民搜刮巨款，却没有对水利工程进行治理维修，使成都农业的命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面积由过去的300万亩缩小到1949年的200万亩。1949年，成都遭受洪灾，市区春熙路等37条街道均被水淹，全市受灾的约6万余户。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被迫成群结队地向官僚地主“大户”借粮，“吃大户”，最后发展为抢米运动。

上述事实表明，近代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抗日战争期间曾有较大发展，但为时短暂，抗战胜利后迅即江河日下，至1949年解放前夕已濒临绝境。而成都社会经济的真正蓬勃发展，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的。

（陈绍乾）

解放36年经济建设的主要历程

1949年底，成都获得解放，城市统治权回到人民手里。从此，成都的经济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时期。

到1985年为止的36年时间，成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体上经历了3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起步发展阶段；二是曲折发展阶段；三是健康发展阶段。

起步发展阶段

从1950年到1957年这8年时间，是成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恢复发展阶段，基本上实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经济建设方针。经过8年奋斗，为